

中譯本序

承蒙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和北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的厚愛，《*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 England, Japan, and China*》得以出版中文譯本。本書的主體部分，是我2007年在美國麻省理工學院政治學系完成的博士論文。博士畢業後，經過五年時間的修改，英文版於2013年由美國哈佛大學出版社出版。1999年開始攻讀政治學博士學位時，我無論如何也想不到，後來竟然會有野心去做不同時段的三個國家的歷史比較。

初進入麻省理工學院讀博士，我的專業方向是「科學、技術與社會」課程裏面的技術史，我當時對技術進步與經濟發展之間的關係，有着特別的興趣。濮德培 (Peter C. Perdue) 是我的指導教授，我跟着他念中國近現代社會經濟史和西歐經濟史。在他的建議下，我也開始學習日語，以便能夠閱讀日本歷史學家有關中國明清社會經濟史的研究。我在濮德培的課上初次接觸到彭慕蘭 (Kenneth Pomeranz)、王國斌 (R. Bin Wong)、李伯重教授等學者的研究，深受啓發之餘，也略感茫然。本系西方技術史的課程內

容，與中國近現代經濟發展關係不大，構擬博士論文的研究方向，讓我頭疼不已。後來到政治系修課，研讀有關國家引導工業化和技術進步的「後發」政治經濟理論，我的興趣也逐步轉向政治經濟學。三年後，我轉到政治系讀博士，研究國家在工業發展中的作用，選題方向則是考慮用西方理論來解釋中國近現代工業化或經濟發展的具體問題。

2001年夏天一個偶然的機會，我讀到了英國歷史學家布魯爾（John Brewer）的大作 *The Sinews of Power*，「震撼」兩字已經不足以形容當時的讀後感。十八世紀英國政府依靠國庫稅局（Excise Department）的官員，從諸如啤酒等大眾消費品的生產和消費中，抽取巨額間接消費稅，用以支撐英國政府發行的長期國債，這一史實與社會科學中頗為流行的新歷史制度學派所宣揚的英國憲政體制，即地方鄉紳通過控制稅收來馴服國家機器，出入很大。這是我第一次意識到，西方社會科學家在創建理論時所依賴的西歐歷史知識，並不一定牢固可靠，甚至很可能滯後於西歐歷史學家的最新進展。而研讀日本經濟史學家速水融等編輯出版的《岩波日本經濟史》這套叢書的中譯本，我發現後發政治經濟學理論難以解釋日本後發工業化這一最為成功的案例。原因有二：其一，日本在被西方列強打開國門之前，本土已經發展出高度複雜的市場經濟體系，並非後發理論裏面所說的「落後經濟」；其二，日本在明治維新之後創建的國家，也不具備後發理論所強調的所謂「強國家」的一些制度特徵。由於新制度歷史主義學派的理論大多基於英國這一典型案例，我開始瘋狂地閱讀相關的英國史研究。與此同時，為了更好地吸收日本歷史學家在日本史研究上的成果，我特地去哈佛大學修了一年東亞系開設的「學術日語閱讀課」，並與日本文學專業的研究生一起，上了一年的古日語課。在大量閱讀英國史和日本史的過程中，我也在思考與中國近現代

經濟史研究相結合的選題。撰寫博士資格論文 (Major Research Paper) 時，我意識到國家財政制度的落後與市場經濟的不發達，二者性質截然不同，發達的市場經濟本身並不必然意味着國家財政制度的現代性。寫完這篇論文之後，我也萌發從歷史角度來比較研究中國、英國和日本財政制度變遷的思路。

這一研究計劃，在2004年幸運地得到了美國社會科學協會的博士論文研究獎學金 (SSRC-IDRF) 的資助，這使我有將近一年的時間在第一歷史檔案館裏查閱資料。雖然我研究題目的重點在晚清的財政變革，但閱讀清代財政金融的奏折對我來說全新的挑戰，所以我有意選擇從雍正期開始提取微縮膠卷，先積累學習經驗，這一無意插柳的舉動，反而讓我有機會深入了解乾隆時期關於如何抑制錢貴的政策大辯論，這是理解晚清貨幣問題的重要背景。我當時按時間順序索取微縮膠卷，從雍正朝一盒一盒看到清末。因為複印服務手續煩瑣，主要依靠手抄，費時耗力，進度緩慢，但卻是消化史料難得的過程。我最大的收穫，是系統閱讀各省督撫針對中央政策提案的議復討論，這些政策討論的內容構成本書中國章節的主要部分。更重要的是，在閱讀這些議復奏折時，我對於歷史進程中的多種可能性，有了一些實在的感悟，而在學習社會科學理論時，雖然也遇到過對所謂「可能但卻沒有發生的歷史」的反事實討論，但大多抽象而空泛。大量閱讀檔案資料，也令我深化對「路徑依賴」這一理論的理解，因為我能在原始材料中辨析出可能但卻沒有實現的多重路徑。有了這樣的經驗，我在閱讀英國、日本的財政金融史研究時，也特別留心重要的政策辯論。這需要閱讀大量專門史的研究成果，如果尚存疑問，則還需要進一步查閱出版的史料匯編，如《大隈文書》、《五代友厚傳記資料》等。2009年夏天在日本東京大學教養學部訪問研究期間，我也有機會閱讀了沒有收入公開出版的《大隈文書》的微縮膠

卷部分。本書英文標題中的 Paths 即取自 path dependence，所以中文也譯為「路徑」，即「路徑依賴」的路徑。

本書從歷史制度主義的角度，研究英國、日本和中國三個國家財政制度的發展變遷。雖然理論框架是社會科學的歷史因果性與路徑依賴，研究的議題是國家形成與財政制度的關係，但具體個案部分，又是對中、日、英三個國家財政制度發展的細緻歷史研究。這給不熟悉相關歷史背景的讀者造成了一些閱讀困難。這樣的寫作，緣於自己內心深處長期存在的一些疑慮：難道歷史社會學家真的是對歷史學家談社會學，而對社會學家講歷史嗎？當社會科學家談論諸如事件性、偶然性、因果過程追蹤等問題時，可以忽視與事件歷史進程相關的種種歷史細節嗎？一個社會科學家，如何面對與自己理論相左的歷史研究成果？對新一代的歷史社會學家而言，在深入歷史過程的細節研究之後，再回到社會科學的議題，去找出藏在細節中的理論魔鬼，這是巨大的挑戰，但值得耗費心血。我在書中作了一些初步的嘗試，本書得到2014年美國社會學學會頒發的比較與歷史社會學的巴靈頓·摩爾最佳著作獎(Barrington Moore Book Award)，表明學界的初步認可。我今後的研究，希望繼續探索歷史研究與社會科學理論的「深度結合」，試圖將中國問題的研究植入更為廣闊的理論和歷史情境中。中國研究本身，不可避免地帶有比較的色彩，與其被動地接受建立在西方歷史研究基礎上的社會科學理論，不如推本求原，主動學習西方歷史家的研究成果，更有批判性地看待西方社會科學理論。當然，這樣的研究取徑，可謂「路漫漫其修遠兮」，難有立竿見影之功效。

本書的背後，凝結着很多人的支持與幫助。我的論文指導教授伯格(Suzanne Berger)引領我進入政治學的研究。我最初跟她提出這一課題時，她明顯持保留態度，但她的保留又不失建設性，

她與我討論最多的，即是這一選題研究的可行性。當我的初步研究使她認可開題報告之後，她反而以批判的方式來表示全力支持。針對論文的導論和理論章節，她的意見有時候甚至尖銳到令我徹夜不眠，苦苦思考回應。但她的批評與意見，又能讓我得以避免因細節干擾而失去論證的主要脈絡。沒有她的悉心指導，我從北京回到麻省理工學院後能用兩年時間完成論文，簡直不可想像。

濮德培是我在麻省理工學院學習技術史的指導教授。他向我展示了歷史研究與社會科學結合的魅力，但正因為如此，我最終決定轉到政治學系，以更為系統而全面地學習社會科學。當我向他陳述轉系的理由時，他極為大度地表示理解，並跟我講述他當年去密歇根大學跟蒂利 (Charles Tilly) 學習歷史社會學的一些往事。他的支持令我深受感動，因為讀博期間的轉系，在美國大學研究生院的人事關係上是敏感事宜。我在政治系讀博士期間，濮德培是我論文委員會的成員之一，但我從心裏認為他也是我的論文指導教授，而他也將我視為他的學生。

塞繆爾斯 (Richard Samuels) 是我論文委員會的第三位成員，他以研究日本當代政治而著稱，非常強調從歷史角度來看當代問題。他自己也曾從國家形成的角度對明治日本與意大利做過歷史比較研究。他雖然是美國人，但我跟他學習交往時，經常感覺他好像是一位要求嚴格、一絲不苟的日本教授。伍德拉夫 (David Woodruff) 教授在我論文的開題階段給予很多的指導，特別是在撰寫 SSRC-IDRF 申請資助的計劃書時。可惜他後來離開麻省理工學院，去倫敦政治經濟學院任教，我失去了在論文寫作中與他深入探討的機會。

在北京的第一歷史檔案館研究那一年，我的身份是北京大學歷史系的訪問學人。羅新教授在生活和工作上給我很多幫助，郭

潤濤教授在清代財政史和政治史方面給我指點良多。與茅海建教授頗有戲劇性的初次見面，則是在第一歷史檔案館的閱覽室。午餐時聽他講查檔的經驗體會，令我大開眼界。他在檔案館工作之勤奮，堪稱後輩楷模。在一檔館查檔期間，我認識了師從茅海建教授的北京大學歷史系的博士生任智勇，他研究晚清海關，跟我一樣，幾乎每天都泡在一檔館裏面，我們之間的交流和討論，是枯燥的查檔工作中最為愉快的經歷，沒有之一。中國社會科學院的王躍生教授也向我介紹過很多查檔的經驗。在北京工作期間，清華大學的老友彭剛和葉富貴也給我無私的幫助。

2007至08年在哈佛大學的費正清研究中心做「王安博士後」期間，我開始着手將博士論文修改出版。在修改過程中，歐立德(Mark C. Elliott)、包弼德(Peter K. Bol)和沈艾娣(Henrietta Harrison)等教授給我不少建議。費正清中心還資助我邀請奧布萊恩(Patrick O'Brien)、王國斌、濮德培、金世傑(Jack Goldstone)以及何漢威等教授來參加我的博士後工作坊，對論文的修改提出很多具體建議。奧布萊恩通讀了論文，並針對其中的英國章節，手寫了12頁的批評建議，令我感動不已。而當時我們尚未見面，僅靠電郵聯繫。何漢威教授對我論文的中國章節給予很多細心指導，甚至腳註中的錯字也難逃他的慧眼。2009年以後我有機會到台灣中央研究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訪問，有幸多次當面向何漢威教授請教，他知識之淵博與待人之謙和，令我油然而生敬意。

2008年在哈佛大學費正清中心做博士後期間，我幸運地結識了當時正在哈佛大學燕京學社訪問的三谷博教授。三谷博教授對幕末維新时期日本政治史的研究，令我仰慕已久。能當面向他求教，我倍感榮幸。三谷博教授鼓勵我加強日語學習，以更好地吸收日本史的研究成果。在他的安排下，我於2009年夏天第一次訪問日本，在東京大學教養學部修改書稿的日本章節。三谷博教授

給予的悉心指導，終身難忘。東京大學社會科學研究所的中村尚史教授在資料方面也給我很多建議。早稻田大學的費伯 (Katalin Ferber) 教授通讀了我的博士論文，並給出具體的修改建議。國際基督教大學的斯蒂爾 (M. William Steele) 教授和達特茅斯學院的埃里克松 (Steven J. Ericson) 教授也幫助我改正日本章節中的一些錯誤。在東京訪學期間，岸本美緒教授和黑田明伸教授也對書稿的中國部分提出過意見。

在香港科技大學社會科學部任教期間，與龔啓聖教授的討論令我受益良多。時任人文與社會科學學院院長的李中清教授非常關心書稿的出版，他特別組織會議，邀請彭慕蘭和李伯重教授來給書稿的修改提意見。彭慕蘭教授仔細閱讀了書稿，提出很多寶貴建議。雖然我在書裏批評加州學派只重地區而忽視國家制度，並認為中國和英國在國家財政制度上的「大分流」，遠在因工業革命產生的人均所得「大分流」之前，但與彭慕蘭教授討論時，他的意見總是坦誠而具體，沒有絲毫門派之見。利特爾 (Daniel E. Little) 教授和梅慈樂 (Mark Metzler) 教授則以特別的方式給予我幫助，梅慈樂的意見更使我避免了一些史實方面的錯誤。傅漢斯 (Hans Ulrich Vogel) 教授作為期刊《近代中國》 (*Modern China*) 的審稿人，對本書清代紙幣發行部分提出過很好的意見。由於與哈佛大學出版社的出版合同的簽約在文章正式發表之前，按照學界慣例，我將《近代中國》考慮刊發的文章撤回，但文章內容即是本書的第五章，因此我必須對傅漢斯教授的意見表示感謝。同時，我也要感謝與邱澎生、李卓穎、李新峰、馬世嘉 (Matthew W. Mosca)、卜永堅、張瑞威等學界同道好友切磋討論。

書稿的完成與出版離不開家人的理解和支持。我在美國攻讀博士學位，前後長達 11 年。過分漫長的求學，曾讓父母和永壽和

徐曉華感到困惑不解甚至不安，我非常感謝他們的寬容和理解。母親在2005年來美國幫我照看出生不久的兒子，使我在北京能夠全身心投入檔案研究。弟弟和勇在昆明替我盡到長兄照料父母的責任。妻子馬艾倫 (Ellen McGill) 作為書稿的第一讀者，在寫作、編輯、校對上付出了大量心血。

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的林穎以極大的熱情推動本書的中文翻譯，我對此深表謝意。安徽師範大學汪精玲老師的譯稿認真細緻，找出幾處日文名字的英文拼寫錯誤，汗顏之餘我必須向汪老師致謝。在汪老師的譯稿基礎上，我進一步做了修訂，統一了專業術語的譯法，並提供了中文史料的原文以及日文史料的中文翻譯。如果譯稿中尚有舛誤，自然是我的責任。北京大學歷史系的申斌博士，指出中文譯稿中的一些錯誤，特此致謝。